

从政治性到身体性： 陶丽·莫伊的女性主义思想

李 芳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715;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市 100089)

摘 要:陶丽·莫伊(Toril Moi)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权批评家,其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女性主义理论政治性的诉求,以及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在对波伏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她转向了对具身的存在的关注,为理解波伏娃思想翻开了新的篇章,使后现代主义浪潮中争论不休的性别问题在情境化的身体观中迎刃而解。由此,她在女性主义批评上完成了从政治性到身体性的过渡,使女性主义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陶丽·莫伊;女性主义;政治性;身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6-0117-07

陶丽·莫伊(Toril Moi)不仅是美国也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在女权批评上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对女性主义理论政治性品格的诉求和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独树一帜的批判。同时她也是波伏娃研究专家,带动了许多学者重新认识和评估波伏娃的地位,并用其情境化的身体观创造性地回答“女人是什么”这一女性主义难题。莫伊是一位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多产评论家,迄今为止出版了7本专著,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两部:一是《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 & 2002),该书已被翻译成11种语言,2002年新增“后记”再版,再版时莫伊没有进行任何修改,认为“该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理论革命’时期,是彼时彼刻的产物,没有必要更新”^{[1]Afterword, 175},但她在1999年的《女人是什么?以及其他文章》一书前言中对自己早期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和修正,认为自己当时还很年轻,该书的写作是在夹缝中挤出时间匆匆完成的,难免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2]Preface, xi-xv};二是《女人是什么?以及其他文章》(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1999),后来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于2005年取其前面两章单独成书为《性、性别和身体》(Sex, Gender and the Body)。她还编辑出版了《克里斯蒂娃读本》(The Kristeva Reader, 1986)和《法国女性主义思潮读本》(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1987)两本书,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莫伊是一位勇于表达思想并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在女性主义理论尚处于踌躇中摸索前进的1980年代,她毅然将“理论的政治性”这面大旗高高举起,使文学理论获得了新的动力;在波伏娃处于各种误解与敌意中几乎被女性主义者淡忘的1990年代初,她将波伏娃的个人生活与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波伏娃以其具身的存在得到全新的考察;在性别问题成为后结构主义者争论焦点的20世纪末,她将身体置于各种情境中,为理解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新的思路。莫伊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发

* 收稿日期:2013-03-31

作者简介:李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科研项目“美国当代女权文学评论家研究”(YB20091003001),项目负责人:金莉。

展,使其成为女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中坚人物。

陶丽·莫伊对我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她的成名作《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林建法等译成中文,1992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必读书,重要章节频现于各种文论选集中,如柏棣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2007)、朱刚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2006)等。程麻在该书中文版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越超法国和英美二者立场的‘第三种’努力”,具有“‘不同凡俗’的理论思维方式”^{[3]4-5},称得上是“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最新的权威性著作之一”^{[3]7-8}。莫伊本人曾于1984年和2008年两次来中国,先后在北大、北外、南大做过讲座,我国学者和她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过深入交流^{[4][5]}。尽管我国学界不乏对陶丽·莫伊思想的介绍,其相关研究与运用却很少,而且比较零碎,具有片断性。如何将其置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体框架及其个人的思想发展脉络中予以考察,对于理解莫伊本人以及当今女性主义理论的流变,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理论的政治性诉求

莫伊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顶峰时期,该书一经出版即“因其对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屑引起了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论争”^[6]。面对女性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百花齐放,莫伊认为“让姐妹情谊扼杀我们的政治论争显然不利于为女性主义的斗争带来建设性的贡献”^{[7]Preface, xiv},她从方法论和理论的政治意义上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了审视。莫伊强调该书“既不是对各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概观”,也不是“对女性主义文本的研究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探讨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运用的方法、原则及政治”^{[7]Preface, xiii}。该书自始至终强调理论的政治性,“正是基于政治理论,女权批评才得以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7]87}。同时,莫伊试图改变“理论”的含义,即从传统的文学理论转向同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后现代思潮一样,关注主体性、意义、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理论。莫伊在2002年版该书后记中反复说明自己并非要“对女权主义理论与批评进行综述,而是着力于对理论进行诉求”^{[1]Afterword, 175}。正如该书标题的落脚点为“政治”,莫伊在分析盎格鲁——美国女权主义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时,无不将政治性当做核心评判标准,在开篇就指责肖瓦尔特没有看到伍尔夫文本中的“政治性”,试图用一种不同的理论方法挖掘伍尔夫的政治性,从而使“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其女性主义政治观得到解救”^{[7]Introduction, 9}。在关注政治性的同时,莫伊也非常强调文本的美学价值。她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解构政治性与美学价值两者之间的对立,关注美学价值中的政治性以及政治方法中的美学价值。莫伊反对肖瓦尔特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的方法,认为她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都没有逃脱传统的审美价值的束缚,没有注意到“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使父权的美学价值、历史和传统影响我们所要建构的‘女性传统’”^{[7]Introduction, 82}。她总结盎格鲁——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时,认为其核心悖论在于“尽管它常常坚定而毫不含糊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它最终仍然政治性不够强;这不是因为它没有在政治领域走得足够远,而是因为它对性政治的极端分析仍然与那些消解政治性的理论范例纠缠不清”^{[7]Introduction, 87}。莫伊的这一批评,为如何在女性主义文本批评中,将政治性与审美价值完美地结合起来,提出了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分析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时,强调理论的政治性品格的莫伊,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寄予厚望,她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于盎格鲁——美国批评家趋于一致性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去历史性和理想主义倾向来说提供了另一出路。”^{[7]Introduction, 95}尽管法国女性主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气氛中,尽管波伏娃《第二性》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莫伊仍感到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权主义者深入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来解读女性受压迫的传统问题。除波伏娃之外,莫伊还重点介绍了西苏(Helene Cixous)、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这三位新一代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的作品代表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

的主要趋势”，“比起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们更关注女性同书写和语言关系中的具体问题”^{[7]Introduction.97}。作为对波伏娃深有研究的学者，莫伊意识到许多女性主义者仅仅看到新一代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以其对“差异”的强调不同于波伏娃对“平等”的诉求，而没有注意到波伏娃作为这一代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对她们的影响。莫伊坚持认为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和西苏尽管更多地受益于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后结构主义解读，在理论上大量运用了心理分析方法，但她们都同波伏娃一样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致力于反抗父权话语。在莫伊看来，西苏的“女性写作”代表了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性歧视的社会里女性得以自由发挥创造力的乌托邦景观，而“乌托邦思想一直都是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政治灵感的源泉”^{[7]121}，由此表达了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及渴望反抗的欲望。莫伊说：“如果我们将西苏看作是乌托邦女权主义者，至少她的文本中一些互相矛盾的方面可以看作是受制于现存的自身充满矛盾的父权意识与试图摆脱父权束缚的乌托邦思想之间的冲突。”^{[7]122}她一方面肯定了西苏的乌托邦思想中蕴涵的反抗的能量，另一方面也对这一乌托邦想象没能对妨碍女性写作的物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进行批判，认为她的诗意写作没有指向具体的社会结构。莫伊认为如果缺乏对现实的把握，流连于想象空间，女性主义者很容易落入父权意识的圈套，将理性拱手让给男性，成为男性标榜的“直觉的”、“情感的”、“富于想象力的”他者。因此，莫伊反复强调女性主义者必须把握特定的政治现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样，莫伊从政治的角度对伊里加蕾的理想主义和去历史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她没能将父权力量的历史与经济上的特殊性及其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的矛盾性考虑进去，这迫使她提供的是女性的形而上的定义，而这是她自称要避免的”^{[7]148}。莫伊认为一切试图定义“女性”的努力都导向本质主义，因此她对克里斯蒂娃更多地持肯定态度，认为克里斯蒂娃与西苏的不同在于她超越了“女性气质”或“女性特征”之类范畴，不再执着于定义女性，但她也指出：“这是克里斯蒂娃，相对于西苏和伊里加蕾，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能称作是纯粹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原因之一。”^{[7]149}在讨论克里斯蒂娃时，莫伊将其与盎格鲁——美国女权主义语言学并置，总结了她在语言学上的突出贡献，认为其理论的强势在于对作为物质与社会结构的语言的政治性的强调。她也盛赞了克里斯蒂娃对母亲身份的关注，肯定了她对边缘性与颠覆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但也认为她没能解释主体和社会的关系，没能对社会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 analysis，因此政治性并不彻底。

除了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对法国主要女性主义者的介绍以外，莫伊编辑的《克里斯蒂娃读本》和《法国女性主义思潮读本》为促进说英语的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克里斯蒂娃读本》引言中，她对以文本——政治研究为重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原样》(Tel Quel)进行了全面介绍，强调促成克里斯蒂娃政治思想的语境，并对克里斯蒂娃1974年的中国之行这一试图重写历史的政治行为进行了讨论。莫伊指出，进入80年代的克里斯蒂娃开始“同‘一切都是政治性的’这一口号保持距离，强调对人类生活中显然非政治性的方方面面予以更为深刻的理解”^{[8]8}。在介绍克里斯蒂娃的心理分析方法与政治性解读之间的关系时，莫伊将她的分析方法同政客们的解读进行了区分，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分析不同于“在意义的‘唯一性’综合症中无以自拔的政治性解读”，而是致力于“消解主体的种种幻想，说明他们如何在意义的缺场中骤然坍塌”^{[8]302}。《法国女性主义思潮读本》不再局限于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等法国主要女性主义者，而是以法国女性在女性主义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多样性为出发点，力图为说英语的听众展示“如何以新的女性主义方法研究男性主导的历史、哲学和心理批评等学科”^{[9]Preface.vii}，该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使读者得以纵览法国女性主义者在不同领域的思想成就。该书也承继了莫伊的政治锋芒，强调性别差异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拒绝将其予以去政治化的解读。

莫伊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对同时代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引起了女性主义者内部的激烈交锋。1990年，当她出版《女性主义理论与波伏娃》(Feminist Theory and Simone de Beauvoir)时，通过劳拉·佩恩(Laura Payne)与之进行的访谈，历数了该书的消极反应。该书出版13年后，肖瓦尔特在

谈及自己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时不无怨怒地说：“莫伊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分析影响深远，在英国，《性与文本的政治》成为大学的标准教材，许多学生根本没有读我的书，而直接从该书中获得《她们自己的文学》的观点。”^{[10]404}同时，肖瓦尔特指出莫伊对自己的批评多有不实之词。首先，肖瓦尔特认为“她们自己的文学”这一标题并非如莫伊所言，希望远离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传统，而是取自自己在文中引用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一段话。此外，肖瓦尔特强调《她们自己的文学》并非如莫伊所认为的缺乏理论框架，而是不同于莫伊将理论等同于哲学的方法，试图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解决理论问题。针对莫伊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厚爱，肖瓦尔特指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的书写及女性的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她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最终都转向了其他话题。”^[10]但莫伊的批评显然促使肖瓦尔特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反思，她说：“如果我现在来写《她们自己的文学》，我会在文学的亚文化群及后殖民研究理论上有更宽阔的比较基础。我会将‘现实主义’这一文学传统赋予更多的理论意义。”^{[10]404}

莫伊在她本人1999年出版的《女人是什么？以及其他文章》一书前言中，对《性与文本的政治》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与不成熟论断进行了反思，承认自己当时写作不够严谨。但正如莫伊本人所说，“这是一本勇敢而自由的书”，体现的是“年轻、略显轻率、却激情满怀而坚强的女性声音”，记录的是“女性主义理论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刻”^{[2]Preface, xv}，另一方面，莫伊面对自己“靠诋毁其它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成名”的恶名时，强调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作品的批评实为互相帮助，并坚持认为学术上的争端不应该影响学者间的友谊^{[2]260-261}。

任何一部勇于探索、敢于提出观点的著作都是在与各种思想的交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莫伊在2002年版《性与文本的政治》后记中不无自豪地说：“1985年的《性与文本的政治》还是一部介入到颠覆性领域中备受争议、具有前沿性的作品；而2002年，它已然成为教科书。”^{[1]Afterword, 174}

二、具身的存在与波伏娃研究

作为一位思想敏锐的波伏娃研究专家，莫伊对于推动波伏娃研究，重新树立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波伏娃的关注源于她对当时波伏娃研究的不满，一方面她感到对波伏娃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为数不多，另一方面她认为对波伏娃的研究存在许多误区。“由于当代说英语的批评家是透过60年代生理/社会性别区分的镜片来阅读波伏娃49年的作品，他们没能意识到那本著作体现的正是当代女性主义者寻找的对身体的非本质主义的、具体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理解……波伏娃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这一观点完全被当代女性主义者误解了。”^{[2]5}莫伊极为推崇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体现的对个体的具身性的关注，认为体现了波伏娃追求自由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是前所未有的，使我们能够“以普通的、日常的语言而不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辞来讨论理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5]。莫伊在三部有关波伏娃的著作《女性主义理论与波伏娃》(1990)、《波伏娃：一个知识女性的诞生》(1994年，2008年再版，被译成5种语言)、《女人是什么？以及其他文章》(1999)中，都贯穿了对波伏娃具身性思想的理解，并致力于将波伏娃本人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揭示波伏娃的哲学思想与其个人所经历的各种特定事件之间的关系。莫伊对波伏娃的这些研究澄清了许多对波伏娃的指责，极大地推动了对波伏娃思想的再认识。

莫伊在《波伏娃：一个知识女性的诞生》中的研究，尤为充分地体现了她对身体的物质性的把握。莫伊大量运用波伏娃的自传、书信、日记、小说等第一手材料，寻找波伏娃成长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并通过考察波伏娃在与社会压力抗争中的思想变化来解释波伏娃如何在各种话语的交织作用下成长为“20世纪主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知识女性”^{[11]1}。本着哲学与生活不可分割的观点，莫伊在分析波伏娃如何成长为知识女性时，将波伏娃的“个人生活”和她的文本与理论不断融合起来，从而探寻其哲学思想的起源，侧重从日常生活角度追踪波伏娃的思想发展轨迹。莫伊的这一方法一反传统哲学研究中不断抽象化的形而上方法，从身体性角度考察波伏娃的哲学

思想,为理解情境化的身体与其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尝试。莫伊自称该书是“对波伏娃作品中三个文本时刻的谱系考察”^{[11]29},该书的三个部分即以这三个时刻为主线^①。第一部分结合波伏娃的传记《一位尽职女儿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和《青春年华》(The Prime of Life),对波伏娃的教育背景进行解析,通过研究波伏娃作品的接受情况,对她在法国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进行讨论。第二部分对波伏娃的首部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以及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进行分析。莫伊对《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政治尤为关注,认为波伏娃的政治思想在于给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改变社会的理想(虽然是乌托邦式的),并促使读者从自我开始采取行动,而这正是“《第二性》作为20世纪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11]232}的根本原因。在第三部分和后记中,莫伊回到波伏娃的个人生活,试图从回忆录及信件中还原波伏娃的情感世界,讨论对爱情、老年、死亡等的态度。莫伊认为波伏娃的《第二性》及其小说与回忆录体现了她在“不断努力驱赶与死亡做交易的美人鱼”^{[11]236}。波伏娃的身上始终有美人鱼的影子,为了心爱的人宁愿放弃鱼尾换上人腿,即便脚下是针尖和灼炭也在所不惜。莫伊认为在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中,波伏娃自始至终处于从属地位,毕生都在与令人窒息的父权力量作斗争,不幸的是作为女性的波伏娃显然处于弱势,为了维系二者的关系,她甚至将自己与萨特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之间的同盟牢不可破。莫伊将波伏娃的三个文本时刻贯穿于该书三个章节,以其新颖的视角把握了波伏娃作为知识分子的困境及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使其局限性得到理论化,脉络清晰地再现了20世纪中叶法国知识分子女性面临的冲突与矛盾。

莫伊在对波伏娃三个文本时刻的分析中,她对个人生活的关注受到了福柯权力话语与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个人生活琐事记录中,而是将个人的选择看作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作为主体的人成为文本,同其复杂的个人经历与哲学思想之间产生互文关系。这一研究方法使波伏娃成为言说的主体,为理解其女性主义思想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影响女性生存状况的各种具体情境的关注,使女性主义理论从后现代主义日趋抽象的理论游戏中,回归到对主体本身处境的关怀,由此,女性主义批判开始从理论的政治性诉求转向对身体性的关注。

莫伊指出美国学者沿用至今的1953年英译版《第二性》已成为译者帕西尼(Parshley)的文本,由于译者缺乏足够的哲学修养而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波伏娃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讲有损于波伏娃思想的声誉,总的来说破坏了女性主义哲学的声誉”^{[11]40}。莫伊以帕西尼译文中所展示的波伏娃的母性观为例,指出波伏娃并非以自由为名反对女性承担母职,认为目前的社会状态妨碍了女性自由选择母亲身份,之所以有人认为《第二性》极力反对母亲身份,主要源于译文中的错误表述,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对波伏娃的误读,都在于她们参考的是帕西尼的而非波伏娃的文本。莫伊极力呼吁重译《第二性》,认为新的完整准确的译本将对波伏娃研究及女性主义理论与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再三强调“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回到波伏娃的时候了”^[12]。

三、情境化的身体与性别问题

莫伊在《女人是什么?以及其他文章》中,完成了从政治性向身体性的转变。该书不再局限于对波伏娃思想的介绍,而是冲破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在两性差异上的纠结,开始从情境化身体角度考察女性的生存状态,使学者们得以逃离性别差异的桎梏,寻找新的出路。艾特曼(Megil Altman)不无赞赏地称其“给沉闷的房间带来了一缕新鲜的空气”^{[13]6-7}。尽管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对波伏娃的“身体是一种情境”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导致“无法诉诸一个没有被文化意义诠释过的身体;因此,生理性别不能构成一个先于话语的解剖学上的事实”^[14],但莫伊极力推崇波伏娃将

^① 这三个文本时刻分别指:1929年卢森堡花园中波伏娃与萨特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1946年波伏娃突然意识到生为女人与生为男性的不同而开始《第二性》的写作;波伏娃54岁时在日记中倾诉的悲哀、空虚而沮丧的情感。

身体看作一种情境的方法,认为“不仅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完全具有独创性的贡献,而且对当代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理论提供了另一强大而成熟的出路”^{[2]59}。莫伊认为,情境化的身体观将身体置于与世界的关系中,使身体在各种情境中成为具有主体的存在并成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从而既包含了主体性也容纳了客体性。莫伊以此对波伏娃与巴特勒进行区分,认为“她俩在身体的重要性和行动上意见相左:波伏娃相信人是行动和选择的具体化的主体;巴特勒则认为身体是一种弥散的物质化过程的效果”^{[15]65}。因此,莫伊对波伏娃的解读一反巴特勒对波伏娃的精神/身体二元论批判,对主体的具身性给予了积极回应,使身体既不屈从于生理的划分,也不受制于社会话语的建构,而在各种情境中体现并实践自己的各种存在方式。莫伊强调“作为情境的身体”所反映的既不是生物决定论,也不是社会建构论,因为波伏娃的“情境”观肯定的是主体的自由,这一自由与个人的主体性紧密相关,是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无法决定的,“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女性生活实践中暗含着多种答案。莫伊在该书中重新审视了1960年代女性主义者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上的区分,以及近年来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生理性别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的观点,认为本质论与建构论的对质并不能回答女人是什么的问题,“任何企图通过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这一区分的透镜来解读《第二性》的人必然会误解波伏娃”^{[2]73}。她批评了巴特勒对波伏娃的错误理解,她强调,“对于波伏娃来说,女人是指从头到尾,即从出生到死亡都具有女性身体的人,但是身体是她的情境,而不是她的命运”^{[2]76}。对此,莫伊进一步解释道:“对于波伏娃而言,具有女性身体的人并不因为她们满足了特定的要求而成为女性。她们不需要遵循性别歧视者的固有观点或女权主义者对女性身份的理想观。”^{[2]77}莫伊认为巴特勒对社会性属的理解暗示了“任何没有按照主导性的对女性气质的调控话语行事的人都不是女人”^{[2]77}这一逻辑,使“女性”这一指称屈服于父权话语,因此,“与巴特勒一道,我们被困于性别的牢房里,然后永无休止地颠覆性别的陈规旧框”^{[4]159}。与此相反,情境化的身体观关注的不仅仅是颠覆问题,而更是主体的自由问题,并通过将女性的身体置于各种社会历史的特定环境中使女人的含义不再成为唯一,从而获得多重意义。

此外,莫伊强调要回答“女人是什么”,必须使女性主义理论从语言上摆脱形而上的束缚,回归到日常生活领域,因为这才是政治斗争的真正领域。莫伊对具体生活的关注以及对普遍性的拒绝,承继了卡罗尔·吉利根基于“情境观”的女性主义伦理,但与之不同的是,莫伊没有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建构这一情境性,相反,莫伊倡导的是“停止从性别角度思考”,“试图创造一个没有性别歧视思想或者性别规范,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类压制性神话的社会”^{[2]112}。莫伊的这一主张摆脱了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属这两个概念上不断进行抽象化阐释的理论偏向,极大简化了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属这一理论范畴带来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上的问题,使身体的多样化存在通过对特定性的考察获得生存空间。

莫伊对身体的情境化的理解,不仅得益于波伏娃、吉利根等其他女性主义者,也从非女性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养分。她说:“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有其时代,其传统及其语境的烙印……所有的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伍尔夫和波伏娃等的思想,都需要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考虑。”^{[2]256}因此,莫伊强调女性主义者应该学会运用不同的思想,而不是盲目地将其他理论拒之门外。她对皮埃尔·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所进行的女性主义解读及其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莫伊认为布迪厄理论中最有利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是他致力于消解传统的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的二分法,这也是促进她理解波伏娃的作为情境的身体观的关键。布迪厄将性别差异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并从惯习的角度予以深刻剖析:“惯习通过我们的动作、手势、面部表情、礼仪、走路方式以及观察世界的方式既被生产出来也得到表达。社会化的身体必然是政治性的身体,或者说,具身的政治。”^{[2]282}莫伊强调布迪厄这一思想为理解社会权力关系在身体上的运作机制带来了新的通道。布迪厄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对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体察入微,莫伊认为这正契合了女性主义者主张关注长期以来饱受忽视的女性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要求。

莫伊将身体置于各种社会文化中进行考察的方法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认可,杨格在其《生活中的身体/性别:对社会结构与主体性的思考》中,对莫伊的情境化身体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它比起性别这一概念更为有用,因为它“使男性与女性、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的习惯及其交流获得了更多的描绘空间,并照顾到行动的多重可能,使之不必简化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一常态化的异性对立模式”^{[16]417}。柯鲁柯斯认为将身体情境化的方法比起后结构主义来“更具有流动性,照顾到更多的生活细节”,因此避免了“理论主义”^{[17]298}。

情境化的身体观将个人的具体生活实践纳入到抽象的哲学讨论中并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莫伊认为对个体生活的关注体现了波伏娃的写作风格,也对她本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阅读《第二性》,我明白了在构建理论时不忽视个体的存在意味着获得自己的声音并在认可他人的存在中进行书写”^{[2]245}。莫伊强调这也是她自己在进行理论探讨时坚持的原则。因此,阅读莫伊的理论著作时,我们往往看到作者与读者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对话,作为个人的莫伊常常试图以“我”的声音将他/她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阈,这显然体现了莫伊在不同情境中作为主体的存在。

四、结 语

莫伊恪守着批评家的职责,不断矫正着女性主义批评的航向,使之一方面在政治性上获得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又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中使“个人的也是政治的”这一女性主义呼声得到真正的回应。作为一个从挪威来到美国的“他者”,莫伊以其与本土批评家迥然不同的视角搅起了女性主义内部的纷争,使女性主义批评获得新的维度。目前她的研究主要涉及欧洲现代主义的兴起(1870—1914)、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作家、普通语言哲学中语言的图式等。自由穿行于不同领域的陶丽·莫伊,势必带给我们更多不同的思想和惊喜。

参考文献:

- [1] Moi, Tor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2nd ed[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2] Moi, Toril.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OUP, 1999.
- [3] (挪威)陶丽·莫依. 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林建法, 赵拓,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 [4] 何成洲. 性别研究的未来——与托莉·莫伊的访谈[J]. 当代外国文学, 2009(2): 155-161.
- [5] 许庆红. 女性主义理论和普通语言哲学——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托里尔·莫依教授访谈录[J]. 文艺理论研究, 2009(3): 13-45.
- [6] Nagel, Mechthild E. Rev. of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J]. *NWSA Journal*, 2001, 13(2 Summer): 213.
- [7] Moi, Tor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M]. New York: Methuen, 1985.
- [8] Moi, Toril. Ed. *The Kristeva Reader*[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6.
- [9] Moi, Toril. Ed.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 [10] Showalter, Elaine. Twenty Years on: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Revisited[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98, 31(3, Thirtieth Anniversary Issue: III, Summer): 404.
- [11] Moi, Toril.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M]. New York: OUP, 2008;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Introduction to the 2008 Edition*.
- [12] Moi, Toril. *While We Wait: Not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G]//Emily R. Grosholz, ed. *The Legacy of Simone De Beauvoir*. New York: OUP, 2004: 40.
- [13] Altman, Megl. Reality check. Rev. of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J].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18. 1 (Oct. 2000): 6-7.
- [14] 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宋素凤,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2.
- [15] (挪威)托莉·莫伊. “我不是女作家”——当今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J]. 陈旭, 译.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62-71.
- [16] Young, Iris Marion. *Lived Body vs Gender: Reflection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J]. *Ratio (new series)*, 2002, XV 4: 410-428.
- [17] Kruks, Sonia. *Beauvoir’s Time/Our Time: The Renaissance in Simone De Beauvoir Studies*[J]. *Feminist Studies*, 2005, 31(2, Summer): 286-309.